

近代史研究

3

1980

125/
040:1980-3
一九八〇年第三期

目 录

(总第5期)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	董必武 (1)
刘少奇同志的简要历史·····	王光美 (33)
评国外看待辛亥革命的几种观点·····	刘大年 (40)
论历史人物评价·····	苏双碧 (77)
皖南事变·····	何 理 (96)
百团大战应充分肯定·····	索世晖 (120)
历史的见证	

——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前前后后·····

苏克尘 (133)

最后的斗争

——瞿秋白就义前后·····

陈铁健 (149)

黄遵宪《日本国志》初探·····

王晓秋 (177)

关于杨秀清假托天父附身传言的问题·····

邢凤麟 (207)

略论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

易显石 (229)

英国发现太平天国新史料及其价值·····

王庆成 (241)

《大同书》成书年代及其思想实质·····

何 哲 (257)

林译《澳门月报》及其它·····

吴乾兑 陈匡时 (264)

朱德寄自护国讨袁前线的一封信·····

曾业英 徐辉琪 (278)

《民报》的第二次续刊·····

天 石 (281)

一九七九年中国近代史

论文资料索引及书目·····近代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 (285)

抗日战争时期 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

董 必 武

我回到延安一个多月,看见我们各方面的建设,都有很大的进步,很大的成绩。过去,我听到的也很多,到延安后眼见的就更多,把眼见的和耳闻的比较一下,眼见的比耳闻的多得多。一个外国新闻记者对我说:他在来延安前,觉得我们的宣传,有些夸大;来延安后,他觉得我们的宣传太不够了。这几句话给我们在大后方工作的人以很大的鼓励。到延安后就应向大家作一报告,我一回来就感冒,把这个报告一直拖到今天。因回来得仓卒,来不及搜集材料,不能作什么有系统的报告;但看到边区受着封锁,各同志连大后方的报纸也看不到,我讲的只算是一些片断的新闻,各位把它当作几段不完全的报纸看吧!我讲的零零碎碎,拉拉杂杂,不能有很好的系统,这是要请大家原谅的!

今天我讲的总题目是:——大后方的一般概况。

大后方的一般概况,是怎样呢?如果从政治、军事各方面作一概括的说明,我们党有句很好的话,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失败主义的军令”。另外更简略一点讲,也可以用我们党的一句话:“大后方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更露骨地来说是:“蒋介石的个人独裁”。

首先来说一下蒋介石的个人独裁。这个个人独裁的形态,是慢慢地搞完备了。前年八月以前,林森作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那时只是党的总裁、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还没有真正的完成独裁统

* 这里发表的是董必武同志 1945 年春由渝返延后所写的报告,标题为本刊编者所加。

治形态。林森死后,他做了主席,独裁统治形态更完备了。国民政府原有一个“国民政府组织法”,组织法上规定主席的权力只是国家元首和接待外宾,实际上只是国民政府的监印,有任命和命令时盖盖印而已。等蒋要做主席,他就把组织法修改了,主席可以做中国海、陆、空军大元帅,可以兼任任何职务——行政院长及其他一切职务都可以兼。过去国民政府五院院长是经国民党中央提出和通过的,现在便由主席提经国民党中央通过;以前五院院长向国民党中央负责,现在是对主席负责。从这里可以看到,别人做主席时,什么权力也没有,他做主席时,便有一切权力,别人不能兼任何职务,他却可以兼一切职务。现在蒋介石的兼职,有国民党总裁、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这是党与军的。政府方面,他兼行政院院长,不久以前才换了他的舅子宋子文,还是代理的;财政方面呢?四行联合办事处主任是他;教育方面,抗战前兼过教育部长,不久以前兼过中央大学校长,现在,陆军大学、中央军校、中央政治学校、警察学校……的校长还都是他,(笑声)一切都是他。有一个时期还兼任过四川省主席。有这样的一个笑话:有人说,如果重庆市长出了缺,他还会兼市长,甚至与他邻近的那一保的保长出了缺,他也会兼的。(大笑)但可惜他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一切机关的存在都是表面的,实质上一切权力都在他个人身上。我曾经和一个外国朋友研究:国民政府最高权力机关究竟在什么地方?他说是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是一党专政。这样说有点像,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平时则是常务委员会。那末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应该是最有权力的了,实则常委会什么事也管不了。一次,一个国民党的常务委员,问我:“我们陕西省党部书记长是那一位?”我说:“你们省党部的书记长是谁,怎么问我呢?”像这一类的事,不仅他一人不知道,别的中央常务委员也一样,党内有好多事他们都不知道。又如世界注目的国共问题,多少常委时常问我们,谈判的情况如何?这样大的问题他们都不知道,可见最高权力机关不是常委会了。行政院呢?行政院是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但什

么事也都得去问蒋，可见也不是什么最高权力机关。军事委员会也不是最高权力机关，蒋介石用他个人名义打一个电报，可以撤消它的任何命令。此外有一个国防最高委员会，看去该是最高的了，其实也不是。有一个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秘书，问我：“最近有些什么事，知道不知道？”我反问道：“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什么事不知道，怎么还来问我呢？”他说：“我们国防最高委员会什么都管，只有一件事不管，那就是国防。”（笑声）总之，只有蒋介石个人是最高的。他有一个“侍从室”是最高的机关，什么命令，蒋的名字后附一个“侍”字就行，就高于一切。但“侍从室”的组织，在国民政府组织法中是无规定的。

从这几点看来，在世界上，蒋介石可以说是最独裁的独裁，恐怕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子的吧？

再讲一讲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几个问题。国民党曾于政府机关、学校、军营工厂等处进行集体入党的办法，虽没有完全达到它预期的目的，却吸收了一大批党员。考试制度、铨叙方法与各机关设立人事科等都是为着便于一党专政的。去年五月，国民党开了十二中全会，那个会未做一种有意义的事情，只解决了一个党内问题：就是 CC 重新掌握国民党的组织权，陈果夫代朱家骅做了组织部长。故国民党里有一部分人说：“花了×六百万元宰了一个猪”（即朱家骅之“朱”），“结了一个果”（陈果夫之“果”）。又因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杨公达也挤落了，故有人说十二中全会是杀猪（“朱”）宰羊（“杨”）。现在国民党内部意见有很大的分歧，蒋介石感觉到和过去不同；另外党外各种势力，特别是我们党势力的增长，使他考虑到他自己党的实力，于是他想把党加以纯化，以便加强它的统治，便使 CC 上台。陈立夫对人讲：北伐时共产党在国内横行，他做了组织部长，把党内纯化了，把共产党打击了，在他们区域彻底把共产党清除了，捉了共产党员两万多，干部四千多，中央委员有三十七八个。这种说法有无夸大？把我们牺牲的人计算起来，说两万多没有夸大，干部也无夸大，中央一级的都有名字。他说将来要做的事，就是加强内部统治，使党内纯化以对外。对外

是会更加毒辣的,我们看到希特勒德国快要崩溃,他要挽救自己,便用希姆莱为内政部长,而国民党现在重用 CC 管组织,这正和德国用希姆莱是一样,这是一。

第二要证明国民党想加强其统治的,就是“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去年十月间,蒋召集他的党团干部会议,要成立党军,因为日本进攻大大削弱了他的力量,又看到国内的人许多不满,我党力量日增,所以蒋介石就想出这样的一个计划。蒋介石曾有一个讲演,说到这么几点:目前日本还在内侵,“奸党”到处横行,党国已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挽救的关键,就是要恢复黄埔建军的精神,必须发动十万党团员从军。蒋的军队是集体入党的,号称五百万,已经是党军了,为什么还要成立党军呢?他知道军队中的党员是个虚数,不可靠,故另打主意。蒋以为国民党有两百万党员外,三青团还有六十几万团员、编成十万党团员的军队是容易做到的。蒋在讲演中说:“本总裁愿任该军军长”,而且还不止一次,说了三次。总裁是国民党内领袖的职衔,总裁任军长,这也说明他要组织的是他理想的党军,如像德国希特勒的 SA 和 SS 一样。

为什么以后变了形态,号召青年知识分子从军而不限定于党团员呢?第一个便是内部的原因,在蒋介石宣布成立党军后,党部讨论了一下,认为从军是青年的事,大部分人应该是团员。团方面则说:那不是成了团军吗?而现在成立的是党军呢!争执的结果,决定党团两方面各分一半。但这决定,在中央党部,就引起党员的辞职,眼看着行不通,于是又决定党团员只按五万再折半各分二万五千名。其余五万则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因为只有一半是党团员,所以就不叫“党军”,而改为现在的名字。第二是外部原因,蒋对这个军队不仅是想在生活、训练上搞好,武器上也想搞得特别好,这就得向美国要,但美国最恼火的是中国法西斯化,它固然愿意扶持蒋介石,但不愿中国法西斯化,因而对蒋介石成立党军是不愿意帮助的。美国对共产主义,固然不赞成,对法西斯更不赞成。前美国国务卿赫尔有一个名演说,他说这次大战是反法西斯,哪一个角落里存在着法西斯,便要消灭它。不只美国人,中国人也感觉

到这一点。孙科就说：美国跟苏联搞得很好，美国害怕的是法西斯主义，现在它并不怕共产主义，我国想把反共来争取美国的同情是大错而特错的，目前应把反法西斯放在前面，美国不赞成就不行。再就中国内部说，国民党内部聪明人也不赞成成立党军。我们看出他这种阴谋，自然设法揭露它，我们就把德国的 SA、SS 是怎样形成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在报上公布；《新华日报》作了两篇社论，我们说青年应该参军，但为什么不愿从军呢？就因为政府不民主。第一篇说得含浑一点通过了，国民党自然不满意；第二篇社论说得更露骨，就被扣掉了。因为这些内部和外部的原因，使党军的名目不能公然成立，而用了青年知识分子从军的名称，而且冠有远征二字，欺骗作用更大。名称虽不叫党军，而仍保留着党军的形态，如办理这件事的总机关就是国党中央党部和三青团中央团部，各地方也由地方党部和团部负责；青年知识分子从军的指导委员会有六十余人，其中有社会上一二知名人士，但是挂名的，而且他们也都有国民党的党籍。就指导委员会中十三个常务委员来说，那完全是国民党或三青团的要人，如何应钦、吴铁城、陈果夫、张治中、康泽……等，康泽作了主任秘书，他是在三青团中央负责组织工作的人，康泽是一个特务头子。这种党军组织形态，我们不能在报纸上公开批评，但我们能用口头到处讲。重庆及其他地方读我们报纸的青年，看见《新华日报》不登各地青年从军的消息，想着国民党号召的这桩事，中央机关报没有表示拥护，那桩事大概是不好的。我曾问一个学生，为什么你们不去从军呢？他说：我们读《新华日报》，看你们报上，关于青年从军的事一字不提，你们报上不登，那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们对此事也就很冷淡。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训练科长以上的干部，各地党团员还经严格的考试，每年入校二三百人，现共四千多人。为着响应国民党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军的号召，中政学校有二百余人报名。该校党部觉得这个学校是国民党最高学校，应该全体响应才好，党部开了三天会，决定政校全体自愿从军。十月十九日开全校党员大会，特区党部负责人作报告后，宣布了那个预定的决议，并说大家考虑一下，要么赞成，

要么反对,不准讨论。有一人举起手来要求讲话,主持人说有人举手赞成,“好”,就算通过了,马上宣布散会。但散会后,许多人不服,留在那里的还有一千多人,大家另组主席团,自己讨论,认为决议不民主。推定代表去找教育长程天放,说明大会主席团宣布通过决议的不合法。程天放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他说我去查一下,你们散去。代表回来报告,大家仍不散,程派萨孟武去解释,萨在会上把国民党这次组织党军来对抗共产党的意思畅发一番。反对的人不听,把萨哄走了。这时赞成决议的二百余人就闯进会场乱打一顿,大家就被闹散了。第二天停了课,说有“奸党”造谣,捉了四个人,才把风潮压下去。但全校全体从军的消息也消沉了。蒋原来不打算公布什么文件的,因中政校这样一闹,才决定发表告青年知识分子的书,这封书是十月二十四日公布的。青年从军问题,在中央大学也闹了一桩故事,蒋曾兼过中大校长,蒋的号召应该得到很好的回响的,可是蒋告青年书发表后,中大全没声响。校长顾毓琇急了,自己打冲锋先报名,学生说:“好,校长从军,我们欢送”。顾曾编《荆柯》一剧,剧中用了荆柯的两句歌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中大学生就把这两句歌词改为:“风萧萧兮易水寒,校长一去兮不复还”。直到后来,敌人侵入贵州独山,顾放出风声说敌陷贵阳,中大就要解散,学生想不出别的出路,于是才有两千多人报名从军。

那末,是否国民党号召十万青年知识分子从军就完成不了任务呢?不,不是的。最近《参考消息》上讲:国民党自称已有十二万余青年报名从军,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日本打进中国,还在一天一天深入,抗日对人民仍是一个很大的激动,青年的抗日热情还是存在着,这就可以吸收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去。另外他号召组织远征军,这样也容易引诱一些人从军,因为大家不愿意打内战,而愿意打日寇,远征自然是对日寇的。而且远征军是去印度,一切由美国供给,吃得好,穿得好,武器又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派去从军,还可以从大后方沉闷的空气中跑出去,呼吸些新鲜的空气。从军后,蒋介石还发给五千元安家费,入伍后,一切膳宿,待遇都特别

优待,比一般部队生活都加倍的好,并且还找了几个地方,做做样子,这样也很可能诱动一些青年去报名从军。此外,沦陷区的流亡学生、知识分子,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跑到大后方,学校不能容纳,又无法找到职业,甚至东北每年流亡到大后方的青年也不少,他们都是亲身领略过日寇奴役的滋味的,他们都愿意打回家乡去,收复失地,这是第三个来源。第四个来源是公务人员可以从军。公务人员从军,除原薪不动外,外加五千元安家费。大后方公务人员,生活很苦,一个科长,月入一万元,看来似乎不少,但物价高涨,青菜和柴薪每斤五六元,食盐每斤四十元,油每斤二百来元,米六、七千元一市石。平均每人每月需洋三、四千元,才能维持生活。这样万余元的收入维持一家数口人的生活是困难的。如去从军,自己的一份薪水可以多养活家里的一口人,并有五千元安家费,这就首先可以暂时解决一下生活问题。第五,大后方大批的失业,也是一个来源(以下讲到)。有这些后备军,十二万人报名从军,是可能做到的。但报名的人未必个个都能合格。即令有那么多人合格,是否就算达到他党军的目的了呢?这就不见得。因为:一,大多数还不是党团员;二,还未加以训练,在训练过程中可能有变化;三,武器还要从美国拿来,美国对这种表面作国防军召集而实际是党军的办法是否完全无知呢?这还是个问题;四,欺骗遮眼法总会被人民揭穿的。另有值得注意的一方面,国民党军队的生活是很苦的,士兵吃不饱,穿不暖,砂眼、疟疾都很厉害。曾经在重庆有一个团看到从军的知识青年一个连,吃得好,穿得好,就骂起来,后来更打起来了。这说明,把知识青年从军的生活提高,就使原有军队对自身生活更加不满。照他的目的做去,一方面,加了十万战斗力,另一方面却减了二百万的战斗能力。这不能不说是摆在蒋面前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第三,要说明加强法西斯统治的是最近内政部、军政部、教育部的改组。教育部是由这一 CC (陈立夫) 换成另一 CC (朱家骅) 负责。内政部,在外国是最主要的一部,但在国民政府,过去则不然,它是拿来安插一种不重要的人的地方。但现在蒋介石看重

了内政部，用 CC 大将张厉生去作内政部长。因为蒋介石看见赤裸裸的一套法西斯办法行不通，又要玩“宪政”的把戏。于是地方自治啦，选举啦，又喊起来了。蒋要 CC 控制地方自治与操纵选举，所以和国民党内组织部配合起来，内政部用张厉生。国民政府有考试院，权力很大，照它的章程一切公职人员都要经过考试。考“三民主义”，现在还考《中国之命运》，考试获取后才能任职，地方自治人员、选举人，都是一样。考试已经是只便利国民党员，再由 CC 主持的内政部来监督地方自治与选举，那还那里有非国民党人任公职的权利呢？所以蒋用张厉生任内政部长只能看作是蒋想强化他的法西斯统治的一个步骤。用陈诚作军政部长，有人说陈诚比何应钦好，这不是没有道理。如以陈和何个人来作比，陈是比何在品质上有些不同，在抗日这点说来，陈诚比何应钦要好些，因何是失败主义者、亲日派头子，何对建军工作也消极怠工，贪污是最厉害的一个。陈诚在国民党那边说来还没有听见人说他有什么贪污，并且因为他年纪较轻，有事业心，比较积极一些。但是有一点要特别注意，蒋介石用陈诚，主要是来加强反共，陈反共的方法比较要巧妙些，何的反共则较笨，用公开投降敌人的方法是反不了共的。因此陈诚任军政部长，应看到其有更坏的意义的一方面。

下面说一些国民党的几个欺骗人民的办法：蒋介石的独裁，不要把它看成是个简单的问题。

（一）首先是关于民主问题。蒋介石在抗战初不讲民主，在三九年时，因国内人民迫切要求民主，他虽允许于四〇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大会，议决宪法，讲了一下民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一变，我国因抗日而国际地位提高，成四大强国之一，蒋本人亦成为四大领袖之一，国民大会无限期延期，因此他又不让人民讲民主了，后来更任意把国民大会的召集推到抗战胜利后一年以内。说要实行“民权”（注意，蒋介石故意避开民主二字不谈，而用民权字样，是有他特殊用意的。民主在英美有极普遍的含义，而民权则系依照蒋自己规定的内容来表示的），说待战后又要召集国民大会，这是由于去年连吃败仗，想稳定人民对他的信仰。且因英美舆论

严厉批评他的独裁。所以，蒋介石最近又讲要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他是借此来欺骗人民，欺骗英美，企图取得盟邦的援助。

(二) 关于检查制度中放宽尺度问题。在国民党最反动时期，我们《新华日报》上，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抗日胜利的战绩是不许登载的，“边区”字样是不能提的，“三三制”、“新民主主义”更不能提，甚至连孙中山的话也不能登。有一次我们把孙中山先生提倡人民有权的话，在《新华日报》上登出来，检查人员硬把它删掉。我们报馆的人去质问新闻检查所，他们答复的真妙不可言，他们说：“这是我们说的话，你们不能讲。”（笑声）过去国民党对言论的控制，有些话我们只能讲一次，讲两次三次就不行。送检的原稿，检查员任意删改，有时删得文章前后不贯气，你也只能照登，他改掉原文意思，把他的意思添在稿上，有时不通，有时甚至与原意相反，你不照登，他就给你处罚。去年，国际国内舆论都指摘国民党检查制的不合理，经过宪政实施协进会的要求，国民党才允许放宽尺度。所谓放宽尺度实际是什么呢？照国民党规定，凡出版书籍杂志不涉及国防、军事、政治、外交者，都可以不事先送检。过去，连自然科学、历史、哲学之类都是要送检的，现在是采取事后检查的办法，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随时任意检扣，印成书被扣，出版家和著作者损失更大。对于一般言论上也略有放宽之处，但对我们则仍严格地限制着。我们采取各种方法，突破它的限制，所以在《新华日报》上也披露了不少的东西。这就是国民党检查制度中的放宽尺度。

(三) 关于保障人身自由问题。在国党特务政策统治下面，在路上走的人有被抓去的，在家中坐的人有被抓去的，甚至坐在办公厅的公务员有被抓去的。抓去的方式，不依任何法律手续，不公开，被抓到什么地方去拷问和监禁，没有人知道，抓错了的经过要人保释，可能释放，但出来后不准谈被捕及被监禁的情形。去年蒋听见国内要求人身自由的呼声很普遍，国际也有批评国民党统治下这种特务横行的舆论，宪政实施协进会提案要求，国府才被迫公布一道保障人身自由的命令，定于去年八月一日起实施。国人要

求政府公布有权逮捕人的机关，弄了几个月在报上披露一次消息，说政府认为有权逮捕人的是二十几个。实际上不公开取消特务机关，所谓保障人身自由的命令，仅是欺骗国际国内人士的一种手法。举例来说，在重庆北碚附近兴隆场有国民党特务机关设立的集中营一所，在七月只剩一百四十余人，八月保障人身自由命令发生效力以后陡增至二百余人。过去无辜被捕的思想犯和爱国政治犯，既不审判，又不释放，如张学良、杨虎城，新四军军长叶挺以及我党同志廖承志等，至今尚不知道关在什么地方，我曾经对国民党要人说，不管政府公布多少次保障人身自由命令，如果张杨叶廖等不得自由的话那是一文不值的。

（四）关于扩大参政会职权问题。参政会，国民党对外宣传为战时民意机关，实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参政会无论就其组织或职权来说都与所谓民意机关距离甚远，参政员二百四十名中大部分由各省议会选出，但省参议员都是国民党指定的。另一部分则由国民党指派，所以就组织成份来看都与人民没关系，参政会的职权可以听政府各部长官的报告，可以询问、可以建议，但一切决议，都要送国防最高委员会审核后才发生效力。询问权一项在国民党看来已经了不起，实际那算什么一回事呢？去年张君勱、左舜生等在宪政实施协进会内提案要求扩大参政会职权至于能看一下预算，不是审查和议决，国民党拼命反对，后来为着敷衍张左才答应了。看一下预算，仅仅是知道政府一年收支大概情形，而政府拿出来看的还是做好了的一篇皮面帐，实际的收支，它是无论如何不会让人知道的。现在国民政府又公布了省参议会组织法，省参议员规定由县参议会选举，县参议员是经过考试后的候选人，选举时又要经过国民党指定，还不是与人民无关系。但蒋的这类假民意机关的把戏，不是人人都明白的。

蒋介石估计政治形势有几个基本观点：

蒋介石的第一个基本观点是：关于英美联苏合抗击法西斯和它们相互关系问题。这次世界大战英美苏要共同击败法西斯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而在某些问题上的意见又是分歧的。对这

些分歧点，斯大林、罗斯福都说过；邱吉尔没有说，实际上却做了很多分歧的事情，如：英国对意大利、比利时和希腊的政策，便是一个实际的例子。这些事实反映在蒋介石的身上，他认为英、美、苏目前虽合作，将来总会分裂，甚至会打起来。他知道英美是资本主义国家，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这两种国家经济制度是矛盾的，而且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他不知道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威胁着苏联，同时也威胁着英美，这使它们不能不协力抵抗。战后彼此都需要和平，必然都想要找出较长期合作的办法，而某些分歧的问题是不断的在发生、存在和解决中，这反映到蒋介石眼中觉得他们中间的分歧点比共同点还要多一些。这好像赌博的人押老宝一样，他把自己的宝总押在“双”上，想着总有一天会有“双”出现的。

蒋介石第二个基本观点，是从第一个基本观点来的。他认为英美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于是，他反对中国共产党也一定会得到英美的支持。抗战以前，英美是用了很大力量支持他反共的；抗战后英美虽没支持他反共，但用很大力量支持了他也是事实。而且英美国内的金融寡头反对他们国内的共产党，也反对国外的共产党，更会支持了他的立场。这便使得蒋介石觉得国内反共可获得资本主义国家支持的，这一宝押得很稳当。要说资本主义国家会援助共产党，一般说那是不可想像的。但是，目前威胁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生存的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英美的一些爱好民主的人士都看得很清楚，目前反对法西斯主义还是第一的。又因法西斯各国的共产主义者都最英勇、最坚决。一切爱好民主的人士都与以同情并愿意和他们共同对法西斯作战。这在蒋介石看起来自然是很奇怪的。

蒋介石的第三个基本观点，他认为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英美与日本妥协已经成为不可能。英美要消灭日本的武力，他们的海空军，是占优势的，但是要彻底消灭日本陆军，英美把大量的陆军运到远东来决战，是难以设想的。美国海军人员过去曾想从日本本土登陆，以为这样就搞垮了日本，这观点已逐渐幻灭了。要从

海陆空三方面消灭日本，英美就不得不利用中国的陆军，蒋介石自信陆军数量还不少，只要他一天不公开和日寇妥协，英美便要利用他。所以，他认为英美今天将不管他的力量在国内的反动性如何，他依然抗日，英美舆论虽对他不满，但英美统治者都会支持他。蒋介石也知道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目前无论如何，是不会单独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的。

根据以上的基本观点，蒋介石决定的基本方针：一、反苏，二、反共；保全实力，骗取英美的军火，特别是美国的，以加强他反动的统治。但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了强大的力量，国际地位增高了，因此，蒋虽实际反苏而口头上却不能不说要与苏联关系搞好。记得我国驻安卡拉公使曾有电报回来说土耳其政府要人们在押宝，他们想英美早晚一定会反苏，土耳其与苏联的关系总搞不好，一定会博得英美的信任。土耳其政府要人们所押的宝和蒋介石所押的一样。天下事真是无独有偶了。至于蒋介石的反共更是经常进行，虽然事实上碰了几次钉子，但是直到现在他的观点还没有改变。因为目前英美，特别是美国不愿中国有内战，因为全国人民反对打内战，因为他自身武力的削弱和我们力量的加强，蒋介石才在表面决定国共关系用政治方法解决，而绝不表示有政治解决的诚意，实际上仍是“骗”与“拖”。

很显然的，他的观点是错误的。英美与苏联矛盾虽很多。但是目前反法西斯德国战争期间是合作的，即战后的一定期间内也还要合作的。在英国邱吉尔等虽保守，不赞成共产主义，但广大工人与爱好和平的人民是要求与苏联合作的。美国是更加要求与苏长期合作，因为它的基本要求是贸易市场问题。英美现在当局都是实际主义者，他们首先所注重的是行动怎样，至于信仰什么，他们看作是次要的。而且只有像在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才有所谓思想犯，在英美等国，信仰共产主义是不犯罪的。甚至在美国报纸上有人公开说他自己相信法西斯主义也不犯罪。美国正是与法西斯主义国在作战呢。我们共产主义者只要自己在策略上不犯错误，在抗日战争中我们争取英美爱好民主人士的同情和合作，就一定可

能。自然,我们不能说让他们也会相信共产主义,他们不相信共产主义能实现正如我们不相信资本主义会永久存在下去一样,这是属于思想问题。当然,我们若要在策略上犯了错误,那便另是一回事了。

由于蒋基本错误的观点不变,他对国际国内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便不得不采取一些欺骗的办法。其欺骗办法如不在政治生活中深刻体验,是不会知道的。如:最近他在元旦广播中提出要复员,可是自一九四二年以来他一贯是讲“复员”的。他为什么讲复员呢?蒋介石是把他的宝押在苏日战争上的,他希望由英美的海空军消灭日本的海空军,苏联的陆空军消灭日本的陆空军,然后他借同盟国的帮助把他的力量加强起来,收复失地,消灭国内一切异己分子,于是遂有“复员”计划。(笑声)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就当我们的面说过,“中国有什么力量打胜日本呢?只是把日本拖着,等到英美苏把它打垮,我们中国收复失地就是了”。前年十一中全会,蒋介石估计打垮日本只需半年或一年,当时我们想日本为什么半年就能垮台呢?除非是日本火山爆发,大地震,把日本岛沉到海内去才有可能。去年“九一八”蒋介石在参政会开会时说:“中国军事危机已经过去”。但过了几天,他又对参政员说:“自从五月以来,中国的军事危机是一天天的严重”。最近又说:“我相信日寇妄想消灭我们中国的时机,已经过去了”。这些话谁相信呢,甚至国民党的党员也说:“蒋老总的话都是瞎说的”。

蒋介石还另外有一个基本观点,从《中国之命运》中可以看出,《中国之命运》的要点是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这恰恰反映出他自己是法西斯主义的观点。关于《中国之命运》这本书出版和再版的经过在这里顺便讲一下也有必要。《中国之命运》是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二日出版的,那时蒋介石估计: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再没有力量打中国了,因为英美是世界两大强国,这两个强国与日本为敌,日本一定要用全力去准备决战;他又估计日本在太平洋及南洋群岛和缅甸的侵占,一时消化不了,便会放过他所统治的中国。那时日寇在华北华中疯狂地“扫荡”八路军和新四

军,想巩固其占领区,已累得喘不过气来,自然不会搞到他头上去,这时期他在国际上的地位确是提高了,原因是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寇在太平洋、南洋、缅甸横行无阻,美国在珍珠港受到袭击,以致太平洋舰队不能活动。而英国经营多年远东头等军港的新加坡守军八万余人不到二十天被日本攻垮了,不到半年工夫日本把英美打得狼狈不堪,而中国是一个军备很弱的国却抗日抗了四年多,于是英美把蒋介石看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这时,蒋介石的雄心也很大,他跑到印度去打算组织“中印联盟”,想当这个联盟的领袖。可是英国虽然在南洋输给了日本,但谁搞印度还是等于挖它的祖坟。所以蒋介石到印度去,英国开始并不理他,后来才叫驻印总督林里斯哥招待他一下。蒋要见甘地、尼赫鲁,林里斯哥要他在总督衙门接见。他见了尼赫鲁,在回国的路上才见了一下甘地。实际上英国给他碰了一个大钉子。于是,蒋介石回来以后便大骂英国是帝国主义。在写《中国之命运》时,他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自由主义,因为他吃了英国自由主义的亏。自然,反共是更重要的。一九四二年底已写好,他试印了几百本,原来拟订的是五年计划,正式出版时又改成十年计划。这本书出版,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民党内部也受到批评。在欧美影响极坏,尤其英国人不满,只有日本人才欢迎它。这本书为什么引起外国的反对呢?蒋想夸耀他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功勋(其实取消不平等条约是英美送中国的一种也重要也不重要的人情)。说明过去缔结不平等条约的经过,大骂帝国主义,这样一来不仅触犯到美国,更触犯到英国;他对英国不还九龙、香港和不让西藏回到中国怀抱,是很不满的。英国觉得他这本书反英气氛很浓,所以更不满。蒋曾准备把它译成外国文,以王宠惠为指导,组织了一个翻译委员会,其中有一个美国人蒲徕士参加翻译,这个人一向是捧蒋的。蒋征求他对该书的意见,蒲徕士说:“委员长这本书没有表现出委员长人格的伟大”。蒋问何故,蒲徕士说:“你已经是一个全中国的领袖,而这本书中表示你只要做一个党的领袖,这不相称。”又说:“你写的缔结不平等条约的经过都是过去的事情,对同盟国而且好像是算旧帐,对盟友现在不应算旧

帐。”蒋听后说：“嗯，嗯。”同时宋美龄从美国打电报回来，请蒋将该书的英译本等她回来看过以后再出版，她已经知道美国不满意这本书了。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说整个中国是一个宗族，是同一血统等，实际上回族、蒙古族、满族、藏族、彝族等有许多信仰、风俗、言语、文字、经济生活、居住地方，都是不相同的民族。说这些民族是同一血统，简直是伪造历史。这点连国民党内的人都不满意，已经有人写出批评的意见，但不敢公开发表罢了。

对于《中国之命运》的批评，外国虽然没有写出专书，但却经常引用该书里面的语句，于是蒋下手谕说凡是引用该书语句的人，必须得到他的同意。（笑声）

蒋拟把《中国之命运》修订再版，过了一些时又停下来，到一九四四年元旦，终于将《中国之命运》增订本出版了，有什么缘故呢？说起来话很长，不说终不能明白，只好讲下去！

前年十一月开罗会议时，蒋介石曾闹了一个大笑话。罗斯福、邱吉尔邀蒋开开罗会议，是为了要和斯大林开德黑兰会议，先商量一下远东问题，然后好切实布置开辟欧洲的第二战场。开罗会议虽非决定马上和日寇决战，但对反攻的力量和计划要通盘筹划一番，这是应当的。所以罗斯福带了海陆空军负责者和参谋人员及其他要人一百七十余。邱吉尔则以一支战舰带了海陆空军负责者参谋人员经济外交要人六百多人，预备把盟国方面的武力资源做一切实研究。在三巨头会议之外还要开许多专门的会研究讨论。可是蒋介石所带的人连宋美龄的老妈子在内一共是二十个人，在排定参加各种专门会议出席人时，人家问蒋的随员黄仁霖：“贵国参加海军会议的是谁？”黄答曰“委员长”；又问：“参加陆军会议的是谁？”又答是“委员长”；又问“参加空军会议的是谁？”还答是“委员长”。于是外国人说：“贵国怎么只有一个委员长？”黄答：“中国是以质胜量。”当时外国人大为不满说：“我们难道都是饭桶吗？”蒋介石出席这次会没有准备任何反攻日寇的材料，只想伸着手要东西。另外带了一些反苏反共的材料。开会以前蒋与罗斯